从『隔山隔海』到『连山连海』

华侨华人知多少？

——『山海计划』举办第二场山海沙龙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近日，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主办的“向山海走去”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以下简称“山海计划”），在广州图书馆举行了第二场“山海沙龙”活动。

本场沙龙邀请到两位长期关注海外华侨华人研究并活跃于公共讨论中的国际青年学者——刘佳琪和林垚，以《隔山隔海：海外华人的孤独与守望》为题，在兼具国际视野与文化纵深的对谈中，和现场观众共同探讨了华侨华人群体相关的文化议题。

“山海计划”导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院长张振江亦出席了该场沙龙，他表示，在当下，华侨华人群体的生活状态呈现“环流”态势，他们通过自己的生活轨迹，将祖籍国与居住地、工作地等连接了起来。张振江说：“所谓的‘隔山隔海’是地理意义上的，从人心和感情角度来说，可以是‘连山连海’。现在，中国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践行这一倡议的群体，一定包含海外华侨华人。”

扫码了解“山海计划”更多详情

近日，“山海计划”举行第二场“山海沙龙”活动

意义 研究华侨华人群体现实意义重大

当谈论“华侨华人”时，我们在谈论些什么？“华侨”与“华人”两个概念，我们又当如何区分？

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普林斯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博士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社会学博士刘佳琪表示，“华侨”指的是定居在国外且保留了中国国籍的群体，而“华人”是指定居国外且加入了其他国籍，但具有中国血统或者在中国出生的群体。不过，在实操层面，华侨华人的界限没有严格区分。刘佳琪举例：“疫情期间，中国政府在海外派送包含了口罩、防护服、药品等物资的健康包时，几乎不会区分对象是华侨还是华人。”

关注、讨论、研究华侨华人这一群体，有何重要性与现实意义？刘佳琪表示，因与明清海禁政策相背离，早期华侨华人群体的遭遇是“被排斥、被边缘化”的。然而，当家国遭遇危难时，海外华侨华人迸发出的爱国热情与力量为民族独立作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后，华侨华人亦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引入了大量资源。在当下，华侨华人群体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力推动者。“可以说，华侨华人群体是中国公共外交政策最有力的实践者之一。对这一群体报以深切关注，对整个国家来说，都具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

上海纽约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耶鲁大学法学博士林垚认为，海外华侨华人群体以亲身的实践积累了很多关于外界的认知：“明清时期，相比较笼统模糊的官方地图，由下南洋的商人、水手绘制的地图要精确得多。”

林垚认为：“迫于生计、背井离乡的华侨华人也是希望和火种的承载者。在晚清和民国初年，不少革命的思想与火种就是经由华侨华人传播的。多了解华侨华人的境遇和他们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可以在社会、经济、政治等多层面给我们更多新鲜视角，激发新的想象。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探索的精神和独到眼光，把蕴含其中的价值挖掘出来。”

思考 应以更广阔的视角关注华侨华人

携带自身文化基因、扮演不同文化中介的华侨华人，一方面努力适应所在地环境，促成根系文化和异文化之间的交汇互通；另一方面，随着地理上的分离、时间的推移和生活状态的改变，华侨华人与祖籍国之间的隔阂也必然产生。刘佳琪提醒，文化上的隔阂和误读是全世界移民群体都会面临的现象，而非华侨华人独有：“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让沟通的桥梁尽可能地通畅。”

微信等社交软件的出现，降低了跨国沟通成本，也拉近了华侨华人与祖籍国的心理距离。当遇到困难，他们甚至会优先选择国内渠道解决。而优质文化内容的出海，则在提升年轻一代海外华侨华人的身份认同上起到了极大作用。刘佳琪回忆：“我认识一个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女孩，她几乎已被当地完全同化，身上没有任何华人的痕迹。但是，她告诉我，中国的古装剧越做越好，她开始跟着《延禧攻略》《甄嬛传》学习中文，寻找她在中国的根。”

林垚则强调，一直以来海外华侨华人在促进跨文化的交流方面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以“苦力”这个词的由来举例：“‘苦力’在古汉语中不是一个名词，也从来没有被用来形容一个人。实际上它来自爪哇语，是下南洋的华人在汉语中找到一个读音相似又能表意的词，把它生动地呈现出来，形成一个固定词汇。”

关键 “底子”够硬才能扭转刻板印象

2023年，杨紫琼凭借《瞬息全宇宙》成为首位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的亚裔演员。该片讲述了一个平凡的洗衣店老板娘在穿越多重平行宇宙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无限可能，并拯救了全世界的故事。

为何是“洗衣店老板娘”？林垚表示，这是影片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反映。“洗衣在西方人眼中曾是一项很不体面的工作，然而西方中产阶级兴起后，对于洗衣外包的客观需求又存在。华人发现了这一商机，凑在一起开起廉价洗衣店，进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华人加入。”

然而，类似洗衣工的角色设定虽然源自真实历史，但也是华人身上诸多甩不掉的刻板标签之一。华人的荧幕形象长期受到扭曲，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国外观众对华人的印象，也阻碍了他们进一步去了解华人群体和中国文化。

林垚提到，过去赴美的华工由于生活艰苦，又与外界隔离，长期被剥夺话语权，遭到西方人极大的误解。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关键还是要“自身底子够硬”：“如果你拥有了让人尊重的实力，那么情况一定会改变。比如，在电影《火星救援》中，在NASA发射拯救物资失败之后，是中国捐出了自己的太阳神助推器，成为拯救行动中的关键一环。”

“影片这样设计，肯定有对中国市场示好的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中国在航空航天领域取得的成就获得了世界认可。”刘佳琪表示。

启发 多元化视角是创作的关键

尽管有《北京人在纽约》《喜宴》《山河故人》等将目光投向当代华侨华人群体的优秀作品在前。不可否认的是，放眼当下，针对华侨华人题材的文艺创作，仍以书写百年前的故事为主。为什么我们针对当代华侨华人群体的文艺创作略显乏力和单调？

林垚表示，“缺乏深入的生活体验，国内文艺创作者很难对华侨华人的海外生活有深刻感受”是首要原因。另外，对海外创作群体的关注度有待加强，也是重要因素：“其实，海外华侨华人群体中，有很多优秀的创作者，当我们感觉到匮乏时，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注意力投向他们，没有关注到这些创作者。”

受众的阅读和观看视角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刘佳琪指出：“当我们作为观众去阅读、去观看华侨华人故事的时候，我们带着一种怎样的心理期待？如果我们想看到的始终是‘出去打拼、衣锦还乡、落叶归根’这样一种单一的线性叙事，无意识中也会压抑华侨华人的创作以及他们对自身真实生活的表达和呈现。很多时候，我们作为观众，也需要更敞开心怀，下工夫去理解华侨华人群体的多元和复杂，去了解他们面对不同问题时真实的所思所想。”

“山海计划”是国内首个面向青年创作者、以岭南文化和华侨华人故事为主题的电影扶持项目。10位经过层层遴选而来的青年导演，将把自身对侨历史和侨文化的好奇与追问写进电影剧本。眼下，10部短片已拍摄完成，将于10月底正式和观众见面。

对于这些即将揭开面纱的作品，两位青年学者有何期待？刘佳琪、林垚不约而同地表示：“希望青年导演们能有更独特、更细腻的角度，跳出常规叙事，带我们看到超出我们经验的、全新的华侨华人故事。”

关于“山海计划”

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发起的“山海计划”是国内首个面向青年创作者、以岭南文化和华侨华人故事为主题的电影扶持项目。为了帮助青年创作者拓展认知边界，“山海计划”自8月开始启动“山海沙龙”系列活动，力求促成更多文化领域和电影之间的对话。

“高产学者”杨义二三事

□温儒敏

杨义很真实，善良，不做作，他的“癖”是写在脸上的，这很难得

2023年夏天的某一天，脑子不期然浮现起杨义先生的模样：矮墩墩的身材，略大的方脸，眼镜后面眯缝的眼神，用喉部发出带着“呵呵呵”的粤西口音，怡然自得地一根接一根抽烟……

此前他所在的澳门大学曾举办过“杨义学术研讨会”，邀我参加。因为忙，我没有去，只作了几分钟的视频发言。会后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隐约预感杨义可能染疾患疴，就发个微信询问澳门大学的朱寿桐教授。朱回复说，杨义已重病五六年，曾一度回老家电白养病，如今又进了珠海医院的ICU，已病危。我即请朱寿桐替我去看望杨义，并请杨义夫人把我的微信问候念给杨义听。回信说，那时杨义还有意识，对我的问候表示感谢。不料几天后，他就与世长辞了。

我认识杨义兄起码有五十年了。我是1964年考进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他比我晚一年，是65级人大新闻系学生。我们的宿舍离得很近，他住南一楼，我是南四楼，相距不到百米，吃饭也同一个食堂。那时学生不多，彼此应当打过“照面”，或者说过话，记不清楚了。他们入学不到一年就“文革”了，这位来自广东的农家子弟，并不见他怎么“闹腾”过，否则我总还会有些印象的。后来知道他毕业分配到北京近郊的东方红石化总厂，在宣传科做干事。

据说杨义在“东炼”时是“笔杆子”，但“心有旁骛”，负薪挂角，博览群书，等于“自修”完了被耽误的学业。猜想他读的不是新闻学之类，而是文史。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胸有成竹的杨义便脱颖而出，考上了社科院的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唐弢先生。我也在同一年考上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和杨义的专业相同。那时的研究生很少，又是“同行”，便有些往来了。

研究生毕业后，杨义留在社科院文学所，我留在北大，有时彼此都参加一些学术活动，老乡见老乡，总会聊上几句的。他写《中国现代小说史》，要查阅很多民国时期的小说，还托我从北大图书馆找过一些“库本”。

据说杨义写作时可以连续几天不出门，闷着头写。每写完一章，便到街上遛一圈，看看老头下棋，买个板鸭犒劳一下自己。接着又写，又吃板鸭，周而复始，终成正果。小说史出版后，反响并不大，印数也不多，然而搞现代文学的几乎都把该书当作案头必备。

至今恐怕没有哪位研究者能像杨义这样，几乎读遍了绝大部分现代小说。以现今学人“新进”的眼光去看，这部书未免有些“笨拙”，下死功夫，却又不能不承认这部书的开拓之功，何况其资料的丰富是那样诱人。就因为这部书，杨义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地位。

写完现代小说史之后，杨义又接连出版多种有关鲁迅和现代文学研究的书，包括《中国叙事学》《鲁迅小说综论》《中国现代文学图志》《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等等。和他的现代小说史比，这些专论的理论性和创新性明显加强了，各有其学术推进。

杨义是极勤奋的“高产”学者，而且是持续的“高产”。他总是有许多奇思妙想，还有步步为营的规划，如同打仗，有他的学术“战略”构想。也许他觉得搞现当代文学“不过瘾”，在完成上述有关现代文学研究的系列论著之后，便毅然转向，转到古典诗学研究。他提出要“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编撰“大文学史”，并直接“问鼎”古典文学的“高地”——楚辞与唐诗，出版了《楚辞诗学》《李杜诗学》等著作。这是他的第二个研究写作“高峰”。

到了退休前后，60多岁的杨义又一次转向，这次是转到古典“群经”的研究，包括对孔孟、老庄、墨韩、《孙子兵法》《吕氏春秋》等经典的释义，以及对经典形成过程的复原性探索与阐释，力图贯通古今，突破旧学藩篱，打一场学术研究的“大仗”。可是，杨义有关古典文学、文献学等方面的“跨界”研究，却未能得到相关领域学界的重视。

现今做学术、搞项目，要么大而无当，套话连篇；要么是“打井式”，每人报一个课题，皓首穷经，虽有专精，却也难免琐屑。专业分工过细，彼此“围墙”高筑，若有人翻墙“跨界”，就等于“侵犯他人地盘”，难免遭遇拒斥。这种现象在人文学科尤为严重。杨义的“跨界”被冷落，也许有这方面的原因吧。

杨义其实是“书呆子”，专心问学，有点不通人情庶务。他和别人攀谈，总是一边抽烟，一边大谈学术，滔滔不绝地诉说自己研究的新“发现”，以致忘记了时间、场合和对象。还有，杨义已经是社科院堂堂一大“博导”，却又去武汉大学读个在职博士学位。据说他到了珞珈山便忘了自己的学生身份，老神在在，硬是把论文答辩会变成了专场演讲会。

诸如此类轶事在坊间传播，而杨义充耳不闻，我行我素，每天还是自在地抽烟、喝茶、吃板鸭，没完没了地写他的文章。

古人说，人无癖，不可交。杨义很真实，善良，不做作，他的“癖”是写在脸上的，这很难得。可是与他“可交”的友朋实在不多。他身居学术重镇，却又总在学术圈外。有时我想，杨义会不会有些寂寞？这寂寞是否反而促成他躲进小楼成一统，更痴迷于读书治学？在当今学界，像杨义这样有“故事”又痴迷学术的学者越来越少了。

何所冬暖，何所夏凉

□宁碧君

石榴树，黄皮树，芒果树，龙眼树，总能在某一棵树上找到自家的娃

“快点吃呀，再不吃，油又结膏了。”奶奶一边催我们，一边往灶膛里添柴火。

我捧着牛大骨，呵呵呼着热气，狼吞虎咽地啃起来。

爷爷摩挲着那个刻着飞龙的手工暖壶，慨叹当年他看到的那个女工的手是如何的粗糙又灵巧，生活是如何的艰辛。

每到冬天，我的脑海里经常会浮起这些画面来。

记忆中，童年的冬天是真的冷，房顶和屋檐常挂着冰霜，路边的小草，地里的菜，总是会被冻死。

赶上特别冷的时候，我们一连几天都不洗澡。

睡觉之前，奶奶端了水给我们做简单的洗漱。我和弟弟还有堂弟堂妹，围着那盆水坐在一起。我们挨个洗脸，洗完脸再挨个擦身。擦身的时候衣服也不用脱，奶奶把毛巾拧干就往我们的衣服深处掏去。擦到胳肢窝的时候，我们一个劲儿躲，嘻嘻哈哈笑作一团。擦完身子又挨个洗屁股，往往这个时候，水已经跟墨汁一般黑了。

奶奶主打的是环保节约，必须要完成这些工序才换水。换好水后，我们一起把脚放进盆子里洗。有时，奶奶也把她的小脚伸进来。调皮的堂弟经常把水踢到我们的身上，水溅得满地都是，奶奶就佯装要揍他。

爷爷坐在灶炉旁缝补他的旧棉絮，一遍遍重复叙述着他坎坷的往事。那七八只猫，懒洋洋地伏在他的脚边打呼噜。

水雾的暖气让冰冷的房子变得暖和，寒冷的冬天似乎也变得温馨祥和起来了。

那时盖的棉被很厚实很沉，有时盖过头了，甚至连呼吸都上不来。但，实在是暖和。

我们常常在被子上打天九（一种骨牌）。堂弟一输就哭，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打滚，撒泼，耍赖。奶奶操了扁担进来，一声令下：睡觉！我们便乖乖躺下。

耳边是奶奶轻轻的呼噜声，被窝里还有雪花膏的味道，连梦都是香的。

记忆中最冷的，是有一年春节前，表姑妈来我们家做客，爸爸第一次带我们到河对面的茶楼喝早茶的那个早上。我蜷缩着身子走在寒风凛冽的堤围上，冷得瑟瑟发抖，那是刺入骨头的冷。

热气腾腾的云吞终于上来了，我和弟弟三下五除二就扒完了一大碗。表姑妈说：“孩子，有好吃的时候要多想着你们的爷爷呀！”爷爷摸摸我的小辫，慈祥地说：“我不喜欢吃云吞，吃吧，你们吃吧！”

饱腹之后的温暖，还有爷爷的怜爱，对比来时的那种冷，是我回想起来，一辈子当中最暖的时刻。

小时候，一到夏天我们就成了两栖动物：地上动物和树上动物。哪家的小孩不见了，家长第一时间不是去河边找，而是到树下去找。石榴树，黄皮树，芒果树，龙眼树，总能在某一棵树上找到自家的娃。

我们的村子四面都是树。每一棵树上有多少个丫杈，哪一个丫杈坐着最舒服，我们都知道。连捉迷藏，我们都会躲到树上去。我们甚至还会把饭带到树上吃。坐在树丫杈上，吃着饭，逗着小鸟，喂着蚂蚁，不亦乐乎。

村里家家户户都种果树，站在阳台上，或者推开窗户就能摘到黄皮和龙眼。就算不是自家的也可以摘来吃，最多也只是挨家长不痛不痒的一顿小骂。骂完还是会继续摘来吃，被摘了果子的主人也不会责备我们，因为果子多得根本吃不完。

我喜欢坐在窗边的阶梯上吃饭，窗外的小伙伴也端着饭在树下的大石头上吃。我们隔着窗户互相开着对方的玩笑，有时莫名地就对骂起来，却也并不生气。这时，凉飕飕的风从窗户吹进来，好不惬意。

午后，妈妈带我们去菜地拔草。拔着拔着，弟弟总是会喊肚子痛，吵着要回家去吃何济公药散。这时候，如果妈妈叫他去买雪条，他的肚子保准就不痛了。他一溜烟的跑去三界市（乡里的小墟），比刘翔都快。有时候我想，弟弟读书的时候能参加市运会，应该得益于小时候经常跑去买雪条吧。

坐在菜地边，舔着冰冰凉凉的老冰棍，看着夕阳一点点地沉下山去，火烧云把天边都染红了。那，应该是夏天最美好的时刻了吧……

冰淇淋情意结

□朵拉[马来西亚]

我不爱吃冰，不爱吃糖，但我爱冰淇淋

有个镜头很难忘记。

一个小女孩，看着另一个小女孩在吃蛋卷冰淇淋，她的表情是羡慕的眼神，嘴巴张大，似乎口水马上就流出来了！另一个吃得津津有味。叫人仿佛看见下一个镜头，就是张大嘴的小女孩，情不自禁地伸出舌头舔着嘴唇，其实她更想舔的是对方手上的冰淇淋。

这是一个让人心酸的画面。要是在真实生活中遇到，你会不会掏出钱来帮目不转睛、口水欲滴的小女孩也买一个冰淇淋？

我一定会。

因为，冰淇淋真的就是很好吃，连大人也无法拒绝的香甜可口，何况还有香喷喷的蛋卷。

提起“美味可口”这个词儿，可能你会想到炸鸡或炖猪排骨或牛尾巴汤或松鼠鱼或南洋娘惹菜，也有人特别喜欢街头美食如福建面、拉沙、椰浆饭或印度飞饼，但我的脑海却会生出蛋卷冰淇淋来。

现代人对冰淇淋肯定没有特别感受，什么时候想吃，随便走进一家冰淇淋专卖店，叫来大口品尝，甚至一次吃两盘。但在我的年轻时代，那时候的冰淇淋名叫雪糕，属于高档奢侈品。

首次点雪糕，是当时最著名的香蕉船。长形玻璃盘的两边是一条切开的香蕉，三色冰淇淋有白色维尼拉味、深褐色巧克力味和红色草莓味，上面挤上白色鲜奶油、巧克力酱和草莓酱，并撒上花生碎、颜色缤纷的巧克力颗粒和几颗坚果，三个冰淇淋上边有三颗红色车厘子，单是看着便不断“生津”。却不知道为什么对那把插着装饰用的小雨伞格外兴趣。它是不能吃的。

那时候槟城没几家西餐厅，因此很难得有机会点雪糕，所以总是看图片选那最大最贵的。分量大，吃得非常心满意足。

初尝的摆盘雪糕是在西餐厅里叫的，便一直以为雪糕是从西方国家来的舶来品。到很后来才知道，中国的皇帝早就吃上了冰淇淋。最初仅是淡而无味的冰制冷饮。盛夏里，皇帝让仆人到地窖里把冬天贮存的冰拿出来享用。后来，2000多年以前，皇宫的厨师们将水果、葡萄酒、蜂蜜等和山上的雪以及冬天的冰混在一起制成食品，给统治者享用。

西方人的冰淇淋始祖是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他在1295年把制作方法从中国带到意大利，还在冰淇淋里加入动物奶汁，变成乳脂状。意大利著名的艺术收藏家梅迪西家族的女儿凯瑟琳·梅迪西，嫁给法国国王亨利二世时，带过去的嫁妆之一是制作冰淇淋的食谱。一个厨师学会之后，在法国创办首家冰淇淋专卖店，也是他第一个把巧克力和草莓等酱料加入冰淇淋，让冰淇淋变得色香味俱全。1600年英国查尔斯一世访问法国，第一次吃上冰淇淋，“一尝倾心”立马被迷上了。冰淇淋就这样从中国到意大利，再到法国，然后随着查尔斯来到英国。

美味的东西永远不会只留在原地，1700年，美国马里兰州州长开始以冰淇淋招待客人。后来发明手摇冰淇淋冻结机让制作更容易的正是美国人，而且还是一个叫南希·约翰斯顿的妇女。或许是女性天生比男人更爱甜点？

南洋人喜欢把冰淇淋当成饭后甜点。但朋友们点冰淇淋的时候，不会给我点。他们给的理由是：“你不是说你不吃糖也不爱吃冰？”

那是两回事好吗？

我不爱吃冰，不爱吃糖，但我爱冰淇淋。

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但如果我告诉你，那个看着另一个手捧着蛋卷冰淇淋而自己没得吃的垂涎欲滴的小女孩就是我，你就会理解为什么年纪如此老大的我，对冰淇淋却一直有一个情意结。